

10

革命回忆录

周恩来三到梅江

刘 寒

张闻天在东北

雪 浪

刘志丹经神府渡河抗日

杨和亭

长沙和平解放纪实

欧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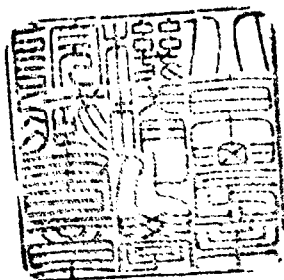
抗大教学生活

李兰布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回忆录

(十)



人民出版社

革 命 回 忆 录

Geming Huiyilu

(十)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35,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500

书号11001·621 定价0.49元

8830451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详尽之处。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周恩来三到梅江	刘 寒(1)
周恩来在武汉沦陷前后	李金元(8)
张闻天在东北	雪 浪(17)
刘志丹经神府渡河抗日	杨和亭(37)
我在红二十八军的一段经历	高克恭(51)
谢子长和刘志丹的战斗友谊	刘明山 刘青山(80)
一九三〇年的安源工人纠察队	方 强(86)
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中共代表团的日子里	萧 鹤(92)
长沙和平解放纪实	欧阳方(109)
西康起义经过	郑 南(125)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队	黄 杰(135)
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	侯正果(140)
抗大教学生活	李兰布(147)
抗大十分校政委黄春庭	刘少卿(157)
汾离公路上的三战三捷	欧阳文(181)
梁山凯歌	戴润生 张 云(188)
冀鲁豫战场上的杨庄之战	杨一年(210)

周恩来三到梅江

刘 寒

一九二五年三月中旬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梅江地区也同全国各地一样，正处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年青英俊的周恩来同志，曾经先后三次来到梅江。^①周恩来同志在梅江地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梅江地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给梅江人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无穷的幸福。周恩来同志在梅江地区的革命实践活动，将永远为人民所传颂。

出师东征 讨伐叛逆陈炯明

第一次来梅江是一九二五年春夏之间。这年春的广东，内有叛逆陈炯明作乱，外受赣、闽、湘、桂四省军阀^②所包围，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危境之中。在广东东南边的香港，差不多是一切省内外敌人的巢穴，是世界帝国

① 梅江，指广乐的程江与耒江汇合处的梅江至大埔县境内三河坝这一地段。梅江地区包括大埔、梅县、丰顺、兴宁、五华、平远、蕉岭。

② 指江西的方本仁，福建的周荫人，湖南的赵恒惕，广西的陆荣廷。

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从一九二二年以来，广东的敌人差不多都以香港作为反动策源地。背叛孙中山的军阀陈炯明，又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和赣、闽、湘、桂军阀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阴谋都是在香港策划的。广东的敌人，除了在香港帝国主义有陆军六千余和海军三万余之外，内部的敌人是：东江有陈炯明指挥的林虎、洪兆麟、刘志陆、尹骥、李易标、熊略、杨坤如；南路有邓本殷、申保藩。东江和南路叛军共有六万兵力。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援桂战争结束之后，就决定自桂林出师北伐。但是，孙中山这一北伐战略大计，一直为陈炯明所极力反对。广东革命政府为要实现北伐，消灭北洋军阀，就必须消灭广东境内的叛军陈炯明和邓本殷，才能统一广东与巩固广东，把广东作为北伐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在广东境内举行平叛，要从何下手呢？欲达统一广东，首要平定粤东，这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战略决策。对于这一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和中共两广区委员会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两广区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的主力是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了很大的比例。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广州革命政府便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颁布了《东征宣言》，并作了东征的军事部署，分为三路向东江进军：右路——由周恩来、李芝龙以及张民达、叶剑英等人领导的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及粤军第一、三、七旅担任，进攻路线是经石滩、石龙（均属东莞境内）向淡水、平山、三多祝（均属惠阳境内）攻击前进，直取海陆丰、潮汕。并

与滇军取得联系，相机北进兴梅地区；中路——由刘震寰以桂军担任，负责进攻惠州城；左路——由杨希闵以滇军担任，由增城、博罗向河源、龙川攻击前进，直取兴梅。右路军是东征获胜的基本力量。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右路军在直取海陆丰、占领潮汕之后，鉴于假出师真叛变、暗中与叛军林虎密约的杨希闵的滇军叛逆行为，在结束了棉湖战役之后，便神速地北进兴梅，追歼陈家军。右路军转战兴梅，陈家军鼠窜北溃。从三月十八日的夜袭五华城（华城）、二十日南清桥战役（兴宁城西南）、二十一日围困兴宁城与罗衣战役（梅县境内）到四月上旬的大柘和东石战役（平远境内），右路军真是旗开得胜，乘胜前进，直逼粤赣边境。在不足三十天的六次战役中，毙伤俘敌不少，缴获甚多。单是华城、兴城、大柘战役初步统计，毙敌数百，伤敌二千余，俘敌军官十七名，缴机枪二挺、大炮九门、步枪二千七百余枝、子弹一百多万发、光洋几十担、洋狗七条，此外，还缴获辎重及其它物资甚多。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这一噩耗传来，东征军官兵和广大工农无不悲痛。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于二十五日由东征军政治部传出之后，东征军政治部于兴宁城内作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决定。其中有两项决定是：（一）东征军政治部出版《青年军人》第四期，为孙中山先生追悼专号；（二）定于三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在兴宁县署公园集合，整队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三十日早晨五点钟，政治部同志们分头布置追悼大会会场，会场设在城的西北边隔河河畔上，即现在的兴城第四小学内。会场布置得颇为庄严肃穆，会场的前门上悬有花圈

和团棉制字“追悼孙大元帅大会”。正中三门横匾字是“河山失色”、“薄海同悼”等，右三门字为“国人皆哭”、“哀震瀛寰”等，左三门字为“浩气长存”、“精神不死”、“革命先烈”；台内除悬挂孙中山先生全身大礼服遗像外，两旁附悬教导一、二团东征阵亡之官兵灵位、遗嘱、誓词及祭仪。上午十一时，追悼大会开始。周恩来同志以东征军政治部的身份，宣读了祭文。追悼大会结束后，东征军开往梅县、平远、蕉岭，继续追剿林虎、刘志陆、李易标残部。此时，怕死的蒋介石却到汕头去了，害怕留在战争第一线。这一时间东征和地方重务均由周恩来等人肩负。

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政治部的同志们于四月十二日上午八时乘船于下午九时抵达梅县城，并驻在梅城黄家祠（即齿塘唇附近）。学生军教导团亦于下午二时步行抵达梅城。十四日上午和下午由政治部李芝龙、洪剑雄同志到梅州中学、东山中学讲演，讲了三民主义等问题。在梅州中学讲演时，尽管在烈日之下，露天听取讲演，但听众精神极为集中，无一人离场。十五日上午，梅县各学校学生齐集东校场，冒雨聆听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报告。二十六日，梅县总商会召开东征祝捷大会，周恩来同志还同商会代表一起照了像。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这天晚上，各校师生提灯游行，敲锣打鼓，非常热闹。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时，政治部的同志们坐船到达松口镇。次日早上六时又离开松口，坐船沿梅江、韩江而下，于当晚十二时抵达潮州。在松口、在潮州，政治部派出周逸群、黄锦辉同志到中学讲演，广泛散发传单。政治部的同志们在潮州广泛展开政治宣传后，于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乘坐火车，六时

抵达汕头市。此时，周恩来同志已在汕头等候，周恩来同志对于党务和政治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由于广州桂军刘振寰和滇军杨希闵勾结陈炯明作乱，东征军政治部的同志们，又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乘坐“新疆轮”，经香港于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向广州航行，二十六日早晨四时抵达白鹅潭，七时抵达广州北校场分校。

挥师南进 战略转移建雄兵

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间。为了挽救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部分革命军队，于这一年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同志，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也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揭开了序幕，在我军建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对创造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到达福建省长汀时，再次讨论了攻取东江的计划。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以主力由大埔县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兵力取潮汕，预料敌人恐慌，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如果把主攻方向放在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迟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之可能。另一种意见，主张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以主力取潮汕，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

州,主要考虑是恐拿不下潮汕,便难以取得国际援助。多数同志赞成后一种意见,遂照后者决定。起义军进入大埔之前,中共东江特委曾派罗伯良、李明光、丘宗海、赖释然等人前往上杭与起义军联系。九月十六日,起义军在李明光、江碧群率领的太宁农民自卫军向导下,自永定县峰市进入大埔县城(茶阳)。三河坝分兵是一个导致失败的决定因素。周恩来同志是不同意分兵的。但是,每谈起这一段历史,他都承担责任,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和后代,不辞咎,不诿过,充分地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九月三十日,起义军被迫放弃汕头,竭尽全力开赴丰顺县汤坑去御敌。当时周恩来同志生病发烧高达四十度,还在前线指挥作战。在周恩来和彭湃同志指导下,成立了大埔县工农政府,委派饶龙光为主席,并张贴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署名的《告革命同志书》,还处决了反革命分子谢炬生、伟民(和尚)。在周恩来和彭湃、朱德、周士第、陈毅同志的关怀下,起义军在大埔还先后送给太宁、英雅农民自卫军近两百枝步枪和一批子弹。在潮州三河坝战役失利后,保存下来的起义军一部(二千五百余人),根据十月上旬茂芝会议的决定,在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下,回师西进湘赣边界,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基本力量。

离沪南航 巧乘车船入永杭

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这个时候正是中央革

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获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的指示，由中央交通局干部肖桂昌、黄华陪同下，坐船自上海、香港、汕头改坐火车到潮州后，再坐船到大埔县青溪（黄华送周恩来同志到达永定交通站后返回汕头。黄是大埔县埔北坪沙人，后来在长征时牺牲），然后由肖桂昌同志护送进入永定苏区。青溪交通站的同志们都为胜利完成任务而高兴。大家在吃饭时，一边吃饭，一边听取周恩来同志讲述国内外形势。周恩来同志对形势了如指掌，深入浅出，谈笑风生，给了交通站同志们极大的鼓舞。他勉励交通站的同志们要艰苦奋斗，不怕疲劳，克服困难，保证被护送的干部安全到达中央苏区。当天晚饭后，周恩来同志由交通站六位武装同志护送，每人带驳壳枪一支离开了青溪交通站，整整走了一个晚上，经过多宝坑、伯公坳，到达了永定县城。在永定县委书记肖尚荣同志的迎接下，周恩来同志胜利地进入了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同志虽然离开了广东，但是，对广东的革命斗争，一直非常关怀。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传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决议，并给广东党组织以多次重要指示，有力地指导了梅江人民和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周恩来在武汉沦陷前后

李金元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寇从水上和陆地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天空每天有飞机盘旋、轰炸，机关、店铺都关了门，人们惶惶不安。国民党政府的文武大员们早已南逃，躲进大后方的公馆里避难去了。可我们的周恩来同志仍然坚持在这里领导武汉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当时，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又是我党的南方局书记，领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兼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工作非常繁重而复杂。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经常不眠不休，组织群众撤退，转移和输送党的干部，组织出版有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社论的最后一期报纸，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小时。

十月二十二日，日军逼近，日本飞机对武汉也开始连续轮番轰炸，形势已十分紧急。但周恩来同志仍指挥若定，于这天下午亲自组织了我党最后一批同志的撤退，并为同志们送行。这批同志是由李克农和潘梓年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乘坐通过关系租来的轮船“新升

隆”号，准备直抵重庆。“新升隆”吨位小，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塞装满了，一百余人乘船显得很拥挤。这时，岸上几十名无钱购买船票的难民要求搭船，周恩来同志告诉大家，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这个要求，挤也要让他们挤上去。说时，他亲自上船一一清点人数，腾挪位置。安排就绪后，他又给大家讲了话，从敌战区带些人民到大后方去，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增加力量。讲话后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要离开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们，许多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新升隆”徐徐开动了，周恩来同志还站在岸上向同志们频频挥手，直到轮船远去。

武汉的形势更加危急了，身边的同志一直催促周恩来同志早一点离开武汉，但他依然那样泰然自若，谈笑风生，总是从容不迫地说：“再等一等”。为了防止万一，八路军办事处留下的人不多了，从汉口日本租界原大石洋行暂时搬到了武昌。二十四日深夜了，周恩来同志又要过江到汉口法租界检查最后一期报纸的出版情况，司机王友许同志把车开到江边，只觉得硝烟味扑鼻而来，原来是敌机扔下一批炸弹后刚刚溜走，还可听到汉口东北面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副官、警卫员、司机他们三人很想劝周恩来同志不要过江了，以免发生意外，但看到周恩来同志安祥的神色，炯炯有神的目光，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一直看到报纸抢印完、散发走，并安排报馆几名工作人员动身南撤，他才离开。到二十五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武汉市，大街上行人绝迹。日寇的炮火已由城外向市区延伸，兵舰也从水上靠近了汉口。这时，他

身边的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同志的危险处境捏着一把汗，但他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还要坚持前去武昌黄鹤楼查看他预先所布置要刷写的日文标语。当他看到“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坟墓”的特大标语，醒目地刷写在城墙最高处，没有错字漏字时，显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当他和同志们告别武汉，一起驱车南下时，正是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到中午时分，日寇的铁蹄就踏进了武汉三镇。

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后，先到了湖北嘉鱼县的燕子窝。原来，他事先已知道从武汉开往重庆的“新升隆”号驶至嘉鱼时，遭到了日寇飞机轰炸，造成很大伤亡。周恩来同志到后，对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作了妥善处理。对其余同志重新作了安排。尔后他又到湖北的咸宁、蒲圻和湖南临湘等地视察了国民党部队，对前线将士表示了慰问。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同志乘坐他的雪福兰小汽车来到长沙市潘子街八路军办事处。对于他的安全到来，我们非常高兴，纷纷围上去迎接他。司机王友许同志立即给同志们讲述了周恩来同志撤出武汉时的惊险情景，大家听了一片啧啧声，个个惊叹不已。周恩来同志面容消瘦，本来就长的胡须似乎又长了很多，但两道浓眉下的目光仍然那样锐利有神。他微笑着向同志们问道：“你们安全吗？碰到飞机轰炸没有？”张元培等同志急忙向周恩来同志转达叶剑英同志的嘱托说：“‘参座’（指叶剑英同志）请你今天就去衡阳。”我们大家也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催起来。可他却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不，今天不走，我要住下来。”我们只好退一步地请他好好休

息休息，工作第二天再谈，可他那肯休息呀，随便洗了一把脸，喝了两口水，连饭也没有吃，就去视察长沙市的几条主要街道，检查由汉口转运长沙的达头中学的抗战物资转运情况，看望尚在长沙的文化界人士。晚上找办事处的同志谈工作，接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知名人士。他精辟地分析形势，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为了工作需要，周恩来同志总是让我们多了解情况。因此，他谈情况，讲形势时，工作人员只要有空都在一旁听着。我们这些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为他那辛勤工作的精神所感染，总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

我们跟张元培、段承贞随罗炳辉、童小鹏等同志，是由西安办事处乘汽车行走半个月，经过老河口、沙市、常德到达长沙的。我们在长沙见到了由汉口撤退的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叶剑英同志正在长沙藩子街布置继续南去衡阳的工作。叶剑英同志带领汉口撤退的很多同志，马上就要离开长沙去衡阳，已是下午五、六点时间了，临行前，他叮嘱我们说：“长沙局势不稳，张元培带几个同志等候‘周公’（同志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称）到长沙后，不要停留，请他立即去衡阳。”我们在长沙几天时间见到和听到的，并传来武汉失陷的消息，长沙城里城外一片混乱，警报一天叫无数次。前方下来的部队川流不息。国民党湖南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束手无策。市民见到军人就问：“长沙能守得住吗？”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回答：“那谁知道！守得住，守不住，是上头的事儿！”

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得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部分同志

撤出长沙还有些踌躇，他把同志们找来亲自作了动员说服工作。他对青年记协的同志们说：“日寇占领武汉后，战略和策略可能要改变，内外形势会起变化，现在长沙大乱，张治中将军难以控制局面。李克农同志已到桂林，你们还是到那里工作为好。”对“周公”，不论党内还是党外同志，都是十分敬重信赖的。听了他的谈话，当天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同志都离开了长沙。这一天的晚上，周恩来同志终于休息了。由于连日奔波，他的司机也够辛苦的。为了第二天旅程安全，我和萧光泉同志去替换司机看车，我们就睡在放在门楼下的汽车里头。大约在十二点左右的深夜时候，潘子街起了冲天大火，门楼上烧着的木板掉到汽车顶上，把我们砸醒了。起来一看，火光染红了半边天，黑烟滚滚，气浪逼人，近处见两个国民党士兵还在将一桶桶的煤油往未着火的地方乱泼，远处是市民的叫骂声、呼救声，乱成了一团。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我们赶紧把周恩来同志叫醒，由邱南章、刘久长（现名刘久州）、张元培等同志护送他沿湘江出南门。周恩来同志对日寇还远在千里，国民党政府就点起一场无名大火，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焦土抗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出席衡山南岳军事会议后到了衡阳，他立即召集全体办事处干部、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任务，安排工作。周恩来同志身着八路军军服，腰间系着皮带，脚上穿着一双短腰皮鞋，身材魁伟，眉清目秀，兼有学者风度和军人气质。他将双手操在背后，来回地慢踱着步子。他分析了一番形势之后，站在我们面前，先用和悦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